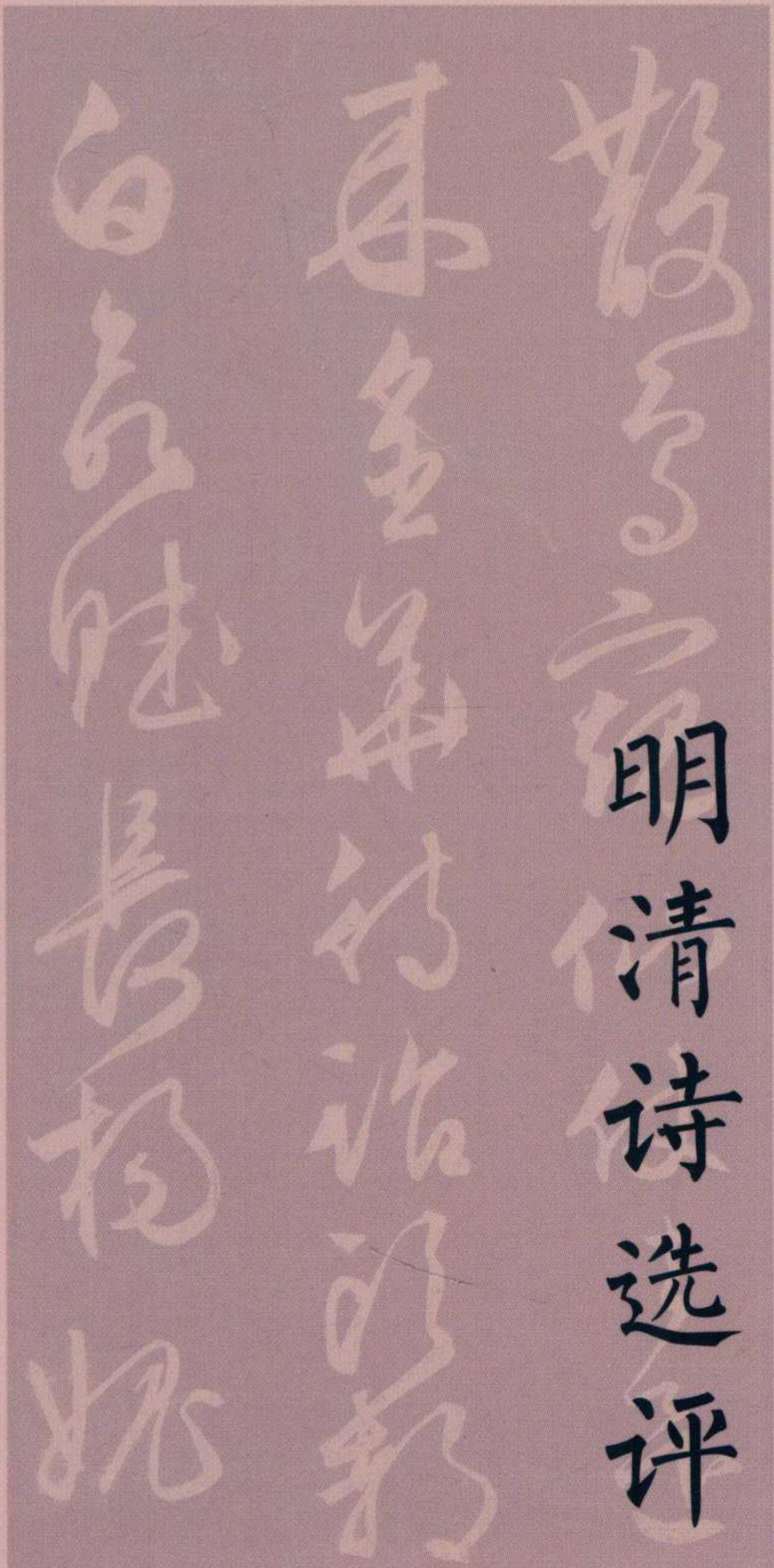


Ming Qing Shi Xuanping

明清诗选评



刘新文◎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Ming Qing Shi Xuanping

# 明清诗选评

刘新文◎编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韦玉莲  
封面设计：林芝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诗选评/刘新文 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7  
ISBN 978 - 7 - 01 - 020499 - 4

I. ①明… II. ①刘…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评论—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2008 号

明清诗选评

MING QING SHI XUANPING

刘新文 编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20499 - 4 定价：5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前言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壮丽的神州沃土，尤其是南方之秀水明山，为其孕育了众多的杰出诗人，邕邕和鸣，响彻中华上空。文学家刘基率先于浙东发抒沉郁之声，其人饱经元末动乱，满腹经纶无所可用，被朱元璋礼聘，辅佐其一统天下，才华大展。其散文与诗歌皆取得和其政绩一样的名传千古的成就。其诗力纠元末某些名诗之秣纤缛丽之弊，反映了元末干戈四起民众难以为生之动荡现实，表现了那时知识者之心态。如《古戍》《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不寐》《北上感怀》等。在风格上可见其有意学杜（杜甫），揭示统治者欺骗压迫民众之罪恶。其古体诗朴拙沉郁，格律诗清新活泼；既追慕古贤，又注重效仿民歌。与刘基齐名的宋濂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以散文名世，又能诗，本书选其诗一首，从中也可见朱元璋杀害能人功臣之阴影。汪广洋，官至右丞相。其诗多台省酬唱，雍容典雅，内容贫乏。其纪行诗作，写景抒慨，清丽可诵。苏州为古老的秀丽水乡，历代产生数不胜数之文化名人，尤为有明一代文人荟萃之都。值得骄傲的是此地孕育出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大诗人。他们时称“吴中四杰”，为苏州增色生辉甚多。明初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应推高启。高启天才横溢，诸体兼备，各体皆有名篇。他与刘基一样经历元末东南战乱，亲见民众所受蹂躏苦难，感时伤事，寄之于诗，写有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之篇什。入明后之诗，或高华雄浑，或明快清丽，或以古鉴今，佳作层出。如《明皇秉烛夜游图》《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等为其代表作。杨基，诗集中自有佳作，佳句甚多，清俊自然，自成家数。前人多以其未脱元末纤巧秣丽之弊。徐贲，所作诗笔法谨严，字句熨帖，其中佳作颇多，清新秀丽。张羽，诗笔力稳健，低昂婉转，音节谐畅，律诗俊逸，然大多为题画之作，深意少见。

袁凯因与“吴中”相距较远，未入四杰中，然其与四杰友谊深厚，实际属于此集团中人。他因写成《白燕》而得绰号“袁白燕”，闻名于世。袁凯后来写出不少好诗，进步大，他不雕琢摹拟，不装深沉雅语，任凭自然流出，每每直抒胸怀。其诗言语流畅，声调铿锵，尤擅近体，七言绝句更是独有特

色。“闽中十子”中的林鸿为其领军人物。明诗坛“诗必盛唐”，追攀李杜（李白、杜甫），此种主导风尚实源于明初。而“闽中十子”可谓源头也，他们是第一个诗主唐音之集团。林鸿之格律诗浑厚冲融，确有唐音格调，然过犹不及，唐音太浓，自己音色味道却被湮没了。因之赞者大加推崇，异议者任意贬责。如反台阁诗的李东阳就是如此。李东阳，立朝中五十多年，领袖缙绅文章，门生满天下，其诗格律严整，宏丽典雅，其论诗特重声调，在他周围形成茶陵诗派。

明初诗人大多出于江南，特别是东南一隅。因为元朝统治者分而治之，将南人列四等，位最卑下，对读书人最鄙视。文人受压迫深甚，以诗反抗发泄必强烈。加之元末统治力量对于千里江南已为强弩之末，股股浪潮在此地不断翻涌，有力冲击着统治者之根基，文艺生机也最先在三楚八闽、吴水越山迸发出来。洪武初年草长莺飞、紫红黄绿，点染着诗坛花草烂漫之春光。但是阳春短暂，明媚阳光瞬间被乌云遮蔽。明太祖朱元璋驱元建明，在其政权稳固后，立马肆意杀戮功臣名将，不过几年就铲草除根。而对文人，这个“马上”皇帝更是天生仇视，视其为他统治天下坐稳江山的绊脚石和天敌，不一个个斩杀，他就心有不甘。徐贲狱死，张羽自沉，广洋赐死，杨基下诏诛，陶凯被杀……明初诗人很少善终，无论是文臣之首宋濂，还是智慧军师刘基，都被太祖忌疑。才人消逝匿迹，因使永乐诗坛任由“台阁体”苍白无力、滥竽充数把持多年。

诗歌需要大自然的阳光雨露，需要活生生的现实土壤之滋养培育，一旦进入严肃、机械、装模作样的台阁，就不会有生机与真情。明永乐到天顺六十余年间，诗坛寂寞，台阁体填补占据了此时的“舞台”，其诗作空泛平庸，缺乏真情，多为平庸蹩脚之作。台阁诗家每每命题作文，其散文为官样文章，诗作多奉诏应制与官场应酬唱和，歌咏升平，颂扬圣德。这样的作品在刘嵩、汪广洋诗中已有显露，吴伯宗之诗句“万岁声呼山动摇”“唐尧虞舜今皇是”“空将诗句美成康”等，全是给皇帝歌功颂德唱赞歌，为封建政治服务，忽视文艺必须描绘大自然、反映现实生活之规律，背离了艺术创作之真谛和法则。吴诗的出笼宣告台阁体正式登上明诗坛。之后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先后入朝，成为重臣。从永乐至正统初年（四朝），社会基本稳定，生产有较大发展。他们人品正直，同心协力，忠耿为国，尽心辅佐四帝，处事慎重勤勉，所创政绩可观。然而让三杨主持文坛，却铸成历史错误。因其位高势大，加之朝中大多显贵不是其门生就为其旧友同僚，为其张扬助势，每有诗文问

世，宇内风靡。台阁体现象与宋初西昆体酬唱的实质大有相同处，然而风格形式却明显不同。“西昆体”追慕李义山，堆砌典故，造语艰涩，意蕴朦胧，隐晦曲折。但是台阁言语流畅，含意明白显近。其致命弱点是，表面典雅雍容，内里平庸肤浅。此台阁体实际也是复古派。有不少作品专门仿效摹拟古人，以致剽窃拆装，以为创新，实际效果千人一面、万曲一调。林鸿《咏怀》、刘涣《清明前一日作》、申从濩《伤春》拿来一对，何其相似。汪广洋《苏溪亭》与这几位的仅个别字句相异。“燕子不来春事晚”汪、林皆有，刘、申仅改“春又去”“花落尽”，似乎为汪始创，其实都从赵孟頫《绝句》中改装而成（见拙作《金元诗选评》，第167页）。之后七子锋芒毕露，激烈排斥台阁体之肤浅空虚、缺乏骨力的诗风，出手应说很是正确，可惜的是同样走上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倡导文学复古之旧路。前后七子在明诗坛延续时间最长，势力最大，对此褒贬不一，引起那时和后世之争辩也最多最激烈。模仿拟古成为诗家不可或缺之功课和通途。

等到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诸位登上并把持诗坛，从理论到实践，把此种袭用拆装、缺乏创造的风气推向极致。李梦阳，恃才负气，以诗名震海内。其与何景明、边贡、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为“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成为集团首领，为正德、嘉靖时期诗坛主将，“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彼此唱和，推波助澜，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摹拟之风泛滥一时。李梦阳，为诗格高调古，豪气纵横，有些抚时感事、不满弊政之作。他对于台阁体虚浮华靡、芜蔓卑弱风气有扭转纠正之功。论诗重法，肯定了民歌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价值。又因其以复古自负，偏重摹拟唐人，流于肤廓，既影响其本身创作，对其身后亦带来不良影响。何景明，节操耿介，志气豪壮，不满昏庸时政，往往发之于诗。文学主张与李梦阳相同，都反对台阁体，主张复古，学习唐人，后又主张创新，与李梦阳争论激烈，这种勤于思索改进的精神值得肯定发扬，惜其过早离世。其诗秀逸，其创作没有如旧评赞扬派所说那么大的成就。边贡，平生癖好聚书，其诗造语清圆，格调平和，清新秀婉，歌行绝句，时有佳作，为七子之主力。徐祯卿，为诸生时，因工诗而著名，少与祝允明、唐伯虎、文徵明被誉为“吴中四才子”。与李、何交游，为七子中重要人物，存诗一百八十余首，足可与李、何鼎足而三。所作诗兼学汉魏唐宋，尤喜白居易、刘禹锡，风格清朗隽永，不泛指陈时事、隐喻讽刺之作。李攀龙，为诗，才力富健，名重一时，和王世贞同为“后七子”领袖；提倡复古，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

唐”，其诗乐府体摹拟汉魏，时有生吞活剥之弊；格律体学唐人，尤工七律，故所作诗大多仿效唐体，虽如此，脱去摹拟痕迹之作，确也清新可读。王世贞，才识渊博，诗文和李攀龙齐名，文学主张与之相同，讲究才思格调，其诗各体皆工，以乐府古体冠于一时。应说其为“后七子”集大成之人物，但其拟作特多，从西周诗经体到盛唐诸体皆有模仿，从李陵、苏武到韦应物、储光羲皆有仿效。然而不似二李那般剽窃改装字句，而是更古奥。谢榛和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交游，被并称为“后七子”。谢榛少时就以诗闻名乡里，后游京师，和众人结社，因声名与年长被推为首领。后来，李攀龙、王世贞声誉大振，谢榛又与李攀龙等不和，被排挤出七子之列。谢榛擅长近体，功力深厚，以声律胜，为当时推重。论诗从格调说出发，推崇盛唐雄浑高远之风尚，极力推尊李白、杜甫等盛唐诗人，揣摩其气韵声情，却不摹拟，难能可贵，并为纠正台阁体的华靡拖沓之弊尽力而为，在“后七子”中为佼佼者，颇有成就。宗臣，诗文主张复古，散文比诗更有名。总之，前后七子的集子里充斥着“机锋园熟，千篇一律”，重复摹拟之作，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不好。

嘉靖初，反复古的唐宋派兴起。到嘉靖时期，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提出反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并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见解，提倡效法唐宋散文。唐顺之对复古派的文风深恶痛绝，批评尖锐，尽管他的文学观念也有很多缺点，但在与复古派斗争中，是有进步意义的。归有光，为晚明唐宋派重要作家，为诗不如为文，诗作不多，但很能反映社会现实。如《海上纪事》《甲寅十月纪事》等为反映明朝倭患之诗史。

从永乐至万历两百余年，明诗坛先后由台阁、茶陵、前后七子占领主导，在这些派别之外，还有几位必须提及的重要诗家。方孝孺，凭文章、理学闻名于世。其诗多表达他羡慕古圣贤臣建丰功伟业而痛斥奸小祸国的理想壮志与浩然正气。于谦，如岳飞一般，为爱国将领，可惜被昏君奸佞害死，他不仅为帅才军事家，而且是名诗人，诗风平实，言语朴素。

明代美术大盛，名家辈出，沈周和较他晚些的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画名满天下，他们作画后每每题诗，在其作风影响下，明题画诗甚为丰富，数量超过明代以前数量之总和。他们都生活在可称为明朝东南艺术中心的苏州城，与李东阳同时代，他们所作诗亦同两者的政治地位一样：李为朝中重臣，必具朝味；苏州画家，草野细民，必有野味。唐、祝、文三人之诗作，秀丽清俊，自抒性情，与其画风相同，常常随意挥洒，清新有余而沉着不足。

唐寅行为放荡不羁，画作取得卓越成果。文徵明诗作以清新秀丽、注重法度见称，凭此高于他人。沈周（石田）诗学白居易、苏轼、陆游，于诗相当审慎，缘情随事，有感而发，言语自然流畅，内容真挚深刻，又能反映社会现实，是画家中诗成就卓越者。杨慎，书无所不览，记诵之博，著述之富，为明第一。曾与何景明为友。其诗才卓绝，随题发挥，多方取法，兼收并蓄，不专主盛唐，不卑六代，间似杜甫，博采晚唐，深沉弘丽。但也存摹拟之迹，亦用工词文曲。王守仁（王阳明）是大哲学家，文学研究者对其重视不够。其实其诗文造诣颇深，散文恣肆纵横，诗作意深流畅，足可自成一家。本书选其《登泰山》和《泛海》两首。

嘉靖年间，诗坛上有“皇甫四杰”之说，即皇甫冲、皇甫涪、皇甫汈、皇甫濂四兄弟，并工诗而著名。另有高叔嗣、华察及后来的高攀龙，这三位诗人共具冲淡自然之风格，明人诗作中具有韦陶（韦应物、陶潜）诗风的以此三位最突出。高攀龙，和顾宪成讲学于东林书院。他主张“格物致知”，兼取朱熹、陆九渊两家之长，反对王阳明“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之说。其诗冲淡自然又淳美，为有明学韦陶最逼真者。

戚继光，为抗倭名将，和俞大猷等解除了东南倭患，屡立战功，边境晏然。文武全才，是继于谦、郭登之后的大将诗人。其诗感情悲壮，昂扬奋发，令人鼓舞。徐渭，著名的书画家、戏剧家，诗、文、词亦有成就。诗多抒发个人慷慨不平之气，言语明快自然，朴实形象，为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所欣赏推重。汤显祖，为杰出大戏剧家，亦工诗，诗存《玉茗堂集》中。

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前后七子把持诗坛，摹拟拼凑成风，延续百年，流弊日甚，反对声浪此起彼伏，其中最为响亮的当推袁宏道代表的“公安派”。袁宏道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时称“公安三袁”。宏道受李贽影响甚深。李贽，力斥“假道学”，大声疾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提倡“童心说”，发掘人的本性，承认生活欲望的正当合理；对文学主张变化发展。李贽明确反对复古派的摹拟剽窃，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和作用，在那时影响很大。袁宏道把“童心说”与欲望合理性变成诗文创作的“独抒性灵”，把李贽的发展变化观理解为要敢于创新，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他慨然以先驱主将自命，庄严宣示：“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韩欧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与李元善书》）袁宏道《叙小修诗》云：“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此评语前八字竟成了公安派反对七子和区别其他流派的鲜明标志，它合理点

明文学艺术尤其诗歌艺术的真谛若干。他驳斥摹拟古人，猛烈抨击时尚的摹拟恶习，倡导创作应自写性情。“三袁”理论有合理可取处，对扭转剽窃模仿之风气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其创作实践草率，多写身边琐事，走上狭窄险路，成效微弱。

另有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公安派”后继起，于诗坛掀起又一大浪潮。他们接受了公安派之基本文学观，也倡导注重独抒性灵，反对摹拟，却更强调诗歌必须写出内心之真实情感，读古人诗作，必须着力体察其中真情实感，强调诗作要有独创。钟惺赞赏袁宏道，却反对人们亦步亦趋袁之后尘的做法。但应看到“竟陵派”的“性灵”和“公安派”的相异，非为指一般之感触、通常之心绪，而侧重于“幽情单绪”“孤怀孤诣”。再从对钟、谭等人的作品审察看来，的确也大多表现了清凉孤僻之情怀思绪，描摹了冷峭凄清之意境。故而“幽情单绪”“孤怀孤诣”也就成了竟陵派作者之内心独白和诗作宣言，学者也就用“孤峭幽深”作为对竟陵派风格之定评。应该肯定的是，钟、谭也强调独创出新，反对人云亦云，照猫画虎。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个度，竟陵追求仰慕新奇，过深过偏，以致走上新僻、奇怪之道路。他们大多描写奇山异水、孤峰峻壑、寒霜冷月、羁旅征途，尤喜描绘凄厉幽深之景物，追求冷僻幽峭之意境。（详见钟惺的《与谭友夏书》《问山亭诗序》《诗归序》等）

朝政黑暗腐败，宦官弄权猖狂，党派纷争恶斗，终使明王朝走向悬崖峭壁，跌入深谷。明末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暴动。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清王朝在北京建立。清兵南下，烧杀抢掠，用残暴血腥的手段对付大江南北的民众。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反抗拒斥新朝的诗人。在血和火之争斗中成长的作家群，再无产生此前种种派别的温床与土壤，那种标准与观点全都黯然失色，渐行远去。

崇祯时期成就较大的诗人当推陈子龙。其文学主张继承七子传统，也曾下大气力摹拟古诗，反对公安、竟陵观点，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其诗大多感伤时事，苍凉悲愤，风格独特。其在世最后三年，诗作紧紧围绕反民族压迫之主题，以往摹拟前人积蓄之艺术修养融会到反映现实的创作之中，写出许多传诵千古之优秀诗篇。著名的抗清诗人还有张煌言和夏完淳。夏为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天才诗人。晚明尖锐的民族矛盾造就近百位著名的遗民诗人，因最著名的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吴嘉纪等的主要代表作皆写在清代，且他们生活在清代的时间比在明代的更长，因此将他们放在清初论述。

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为，明代出现许多闺阁女子诗词人，她们功底深厚，纷纷拿笔挥墨，写出众多优秀的传世之作。本书从《明诗别裁集》及《伊人思》等著作中选取华亭人陆娟、吴江人沈宜修及其女叶小鸾以及江阴女子、屈安人、方维仪等人的7篇诗作。《明诗别裁集》选了郭贞顺、陆娟、沈琼莲、屈安人、黄安人、方维仪、黄幼藻、商景兰、曹寿奴9位女诗人的11首作品。到清代，女诗人大量涌现，《清诗别裁集》（到乾隆时）就收有75位女诗人，142首诗。

明诗从总体而论，固然与唐诗之“珠峰”差距不小，亦不如宋诗之高如“昆仑”，但和元诗之“五岳”似乎可以平起平坐，并驾媲美，甚至有论者认为超过金元。后来的清诗继起，应说有其特色，对其评价众说纷纭，一般评价不高。作者则认为它是诗歌史上又一座“珠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自此中国由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学者将1840年前的文学称为清代文学，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则被称为近代文学。本书则统称为清代文学。无可置疑，元明两代，尤其明代，涌现出许多复古派诗人，出现一股股摹拟拆装仿制的逆流，台阁诗人、前后七子等仿古尊崇盛唐，公安、竟陵虽提出自己之文学主张，力图纠正七子之弊端，理论虽属正确，然而创作成就较之七子，还是稍逊一些，故而成效甚微。穷则变，变则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清诗正是遵循这一规律，在总结明代复古摹拟之经验教训之基础上，在继承开发前代优秀遗产之实践中，在二百多年社会现实的肥沃土壤中，培养出超出元明、媲美抗衡唐宋之异草奇葩。

清初，朝代巨变，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清兵南下，不择手段，剃发屠城，残暴至极。群众反抗斗争长达几十年。这时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诗人。他们反对尊崇唐人，倡导宋诗，提出不少正确宝贵之创作见解与技法，大力扫荡明代诗坛之垃圾弊病，对清代诗风的扭转起了很好作用。此时爱国复明之遗民诗人，数以百计，主要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澄之、阎尔梅、傅山、吴嘉纪等。

黄宗羲，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明末，组织武装抗清。明亡，隐居著述，清廷屡征不就。学识极为渊博，史学成就尤大。文学上强调诗文必须反映现实，表达真情实感，作诗不事雕琢，内容充溢爱国精神，体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坚强不屈的斗志。顾炎武，明清之际的学术泰斗，伟大诗人。明亡奋不顾身投入火热的抗清斗争中。抗清斗争失败后，遍历江河南北，远

游长城内外，足踏之地，观察山川形势，了解风俗民情，联络遗民，图谋恢复。其为学者亦为诗人，写了大量学术著作，也创作了很多辉煌诗篇，是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诗格调悲壮沉郁，多方面反映明清之际的现实斗争，字里行间浸透复国激情；取法杜甫，植根现实斗争沃土，经历战斗烈火锤炼，淘尽泛泛之作，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与沉雄悲壮的艺术风格。各体皆有佳篇，为那时的“诗史”。归庄，顾炎武的同乡与好友，参加家乡的抗清斗争失败后，一度亡命为僧，与顾炎武志同相善，有“归奇顾怪”之说。后到淮阴教书，终身不事清。工诗和书画，其诗多写家国之难，词意酸苦。王夫之，对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皆有研究，尤精于经史、文学。一生著作很多，有的被列为禁书。论诗主张情景交融，“妙合无垠”“以意为主”等，诗多表达抗清思想与故国之思，好用典故，含意深邃。钱澄之，通经学，坚持抗清斗争，终身不事清，自耕自给。其诗学杜，诗风平淡，明白生动，富有现实意义。屈大均，随从桂王抗清，明亡后出家。北上燕赵，踏遍三晋，和顾炎武、朱彝尊、李因笃等交往。工诗词，兼学李杜，擅长描绘边塞山林景物。其诗多写民生疾苦，感伤时事，不事雕琢，气势纵横，悲歌慷慨，寄托遥深，五律尤擅。与陈恭尹、梁佩兰齐名，有“岭南三大家”之誉。抗清复明之遗民诗人还有阎尔梅、陈恭尹、吴嘉纪、傅山、柳如是等。陈恭尹，其父陈邦彦为著名的抗清志士，为屈大均的老师，在岭南抗清之火焰洗礼中屈、陈成为挚友。陈论诗主张不主故常，不分唐宋，“只写性情”。“只写性情”与公安、竟陵“独抒性灵”孤怀幽情的见解相类，然其作无有公安之肤浅显露，无有竟陵的佶僻孤怪。其诗力求革新，常常自铸伟词，反映现实人生作品较多，且内容深刻，生动形象。擅长七律，其咏史诗更胜一筹，将家国之痛与兴亡之感融合无痕，情感真挚，笔墨沉酣，遂成千古佳作。吴嘉纪，抗清活动失败后，长期隐居家园，不惧生活贫困。其诗语言朴素，风格劲健清新，时有严冷危苦之词。他熟悉家乡盐民生活，反映盐民、灾民疾苦与揭露清军暴行、官府欺压民众之作，更具特色，形象深刻，可谓字字血、声声泪。

向来被评为开国宗匠的钱谦益与吴伟业因降清成贰臣而削减身价，然对清初诗界之影响，却大于遗民诗人。钱降清后又反清，大量作品，苍凉激越，复明志愿甚为强烈。艺术上博采唐宋诸名家之长而加以融会贯通，技巧成熟，又有创新，形成自身独特风格。钱以两朝元老、诗坛领袖之身份资望，对吴伟业、屈大均、施闰章、宋琬、王士禛都有影响，论定了他们之诗，且为诸多诗集作了序。吴伟业，诗宗唐，博采众长，多寓身世之感，一些诗揭露统

治者对民众之残酷压榨。各体皆工，风格清丽，音节调谐，既委婉含蓄，又明快爽洁，所作诗号为“诗史”，风行一代，被称为“梅村体”。

此时期另有心无忌恨、参加新朝科举为清政权服务的著名诗人，如宋琬、龚鼎孳、施闰章、汪琬、查慎行等。郑燮，号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善诗，其诗能揭露“盛世”之黑暗腐败，反映民间疾苦，抒发磊落耿介之胸怀，富于个性，风格独特，如书法一样，自成一格。其乐府诗近白居易。王士禛，其主盟诗坛时，南明政权已消失，全国一统，已是“康熙盛世”，民生较安定。清廷对文人软硬兼施，王诗之雍容揄扬，符合那时统治者之需要，因之被皇帝看中，无形中得“桂冠”一顶。论诗创神韵说，影响较大。早年作品澄淡清丽，中年后转为求苍劲，多洒脱自然，富于神韵。擅长各体，尤擅七绝。然客观讲仍未脱去七子摹拟古人陋习。其位高名著，传其衣钵者很多。著名的有叶燮、吴雯、沈德潜等。朱彝尊，与王士禛并称，有“北王南朱”之誉。其诗笔力雄健，用事赡博，体现深厚的学殖修养与功力。然时有用典太过之病。朱王二人虽恢复些许七子的套路，然已非如七子那般死学呆仿、改装袭用。

从康熙到道光前期，大约一百七十年，清王朝由如日中天、繁荣强盛，到步步下滑、如日西斜。诗界涌现出众多流派与诗家。他们争奇斗艳，赛巧出异，前后相继，互为影响。但思想性大多平凡，几无新见，清初诗歌的战斗锋芒消磨，无力冲刺。这可能与民生安定、经济繁荣的社会背景有关，也是清廷大搞“文字狱”压制舆论的必然恶果。即使时而出现一些揭示弊政、反映民生疾苦之作，也是陈陈相因的内容，不敢触及清廷统治之根本与实质。然就流派风格来说，倒是异彩纷呈，“百花”齐放。主要有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叶燮的进化说等。这些说法获得的成果与存在的弊端自不相同，却或多或少促使人们去思索探究。若以地域来说，以朱彝尊、厉鹗为首的浙派诗人占据鳌头。而浙派中又以朱彝尊、钱载、钱仪吉、王又曾等为代表的秀水派最显著。不属、不入宗派的有黄景仁、宋湘、黎简、胡天游诸位。黄景仁，诗多写个人愁苦郁闷，也有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博采众长，自成风格。宋湘，为岭南诗人在屈大均之后的杰出代表，和黎简并称，宋以自然朴素胜，黎以雕琢奇秀胜。宋湘写山水风景诗，自具面目手眼，以古诗手法作七律，以硬笔作七绝。最具价值的是那些反映现实、同情百姓之作。嘉应同乡“诗界革命”旗手黄遵宪受其影响很大。袁枚、赵翼、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三家中当以袁的名气为

大。袁枚，做过几地县令，后辞官，隐居南京随园。论诗高标倡导性灵说，和翁方纲之肌理说、沈德潜之格调说相抗衡。其诗构思新颖，形象生动，善用白描，言语晓畅，所涉颇广，自成一家。张问陶、孙原湘、舒位等是受袁影响较大之诗人。

桐城派古文家兼诗人姚鼐，上承同乡刘大魁之论，顺王士禛之路走，崇尚唐诗，某种程度上肯定七子，又承接伯父姚范观念，极力推崇黄庭坚，说黄诗可以洗涤俗诗之肠胃，将唐诗和宋诗融合一体，兼采二者，以清雅见长，时现雄放，形成桐城之诗派，与袁枚之性灵派旗鼓相争，唱起对台戏。其弟子诗评家方东树等大力宣扬此说。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鲁一同、朱琦，力尊杜甫、韩愈与北宋家数。鲁之师辈潘德舆写出《养一斋诗话》，倾力排斥袁枚诗派，和桐城派遥相呼应。

道光年间掀起了宋诗运动，其先行者程恩泽、祁寯藻皆与桐城派作者交游，难免受其观念影响。晚清“同光体”诗人，如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陈曾寿、俞明震、夏敬观等，皆与程、祁一样离不开桐城派之影响。这些人并未相约却皆立志挽狂澜于既倒，追求诗歌新途径之开辟。然而他们的改革创新，都未跳出学古的领地和范围。此时真正召唤疾风暴雨、冲决万马齐喑、促使天公重抖擞、开辟诗歌新天地的，只能首推龚自珍。其为晚清著名学者，思想家、文学家，为近代新诗风的开拓创立者。其诗多有感时伤世之忧患意识，改革现实向往未来之理想，不只表现了启蒙思想的进步内容，并且艺术形式上鲜明凸显了独创性，大哭大歌，桀骜不驯，好似狂风席卷大地，彗星扫过照亮夜空，旧式传统之思想观念和技巧写法被他打破。龚诗非为风骚古诗，非为汉魏六朝诗风，非为唐音宋调，风格恣肆瑰丽，想象丰富，浪漫色彩浓厚，一种具有独特面目的新型清诗横空出世了！当时与龚自珍齐名的是魏源。他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改革内政，抵御列强侵略，整顿盐政、漕运与边防，支持禁烟运动，著书立说，要求变法富国，为近代改革家和思想家。其反对作诗雕琢，倡导比兴讽喻，其诗题材广泛，多山水之作，亦写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章，姿态万千，较有情致，兼具奔放雄浑和清新雅丽的风格。林则徐，曾任湖广总督，后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广东禁烟，有虎门销烟之壮举，曾被革职，贬戍伊犁。其诗忧时伤世，颇具爱国胸怀。

此时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奋斗目标，也成为此时诗歌的写作主题。描写鸦片战争之诗歌，非为一种流派，而为分属各个流派的作家同写的一个主题。艺术上有突出成就的有姚燮、朱琦、鲁一同、贝青乔、张维

屏。姚燮，擅长诗、词、曲、骈文，尤长于画。写有许多反映鸦片战争之诗，赞颂反侵略斗争，揭露敌人罪恶，斥责清廷妥协投降、求和卖国之官员将领，激昂悲愤。还有反映晚清社会现实和刻画山水之名作，诗风奇肆秾丽，辞无庸浅，兼取李白、杜甫、李贺、李义山之长。巨制长篇注意吸收民歌长处。朱琦、鲁一同、张维屏，都写有许多反映鸦片战争和爱国爱民的诗歌。这些描写鸦片战争之诗歌注进了反帝反封建、斥责屈辱妥协、求改旧制的时代强音与爱国精神的新内容，不同于此前主要表达国内民族矛盾的旧时代的爱国主义诗作，为晚清诗歌开山辟路起了带头作用。

后期清诗并不寂落，涌现出众多流派。主要有倡导汉魏六朝与盛唐的“湖湘派”，代表人物为王闳运、邓辅纶；有提倡学习南北宋的“宋诗派”，代表人物先有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江湜，稍后为“同光体”众诗家，它由江西派的陈三立，浙派的沈曾植、袁昶，闽派的陈衍，以及非为此三派中的陈曾寿、范当世、俞明震、夏敬观等人构成；有提倡唐宋兼采并容的诗派，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南方首领张之洞，旗下有樊增祥、易顺鼎；有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为李希圣、曾广钧。更为重要的是有倡导践行“诗界革命”的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近代诗评家，谈到此时期的诗，除肯定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外，否定其他派别，评其只是保守复古，和明七子区别不大。此说法不符实际，只见表象和树木，未见内里与森林。他们确实都倡导学汉魏，学六朝，学唐宋，可概括为力主学古人，然而他们汲取了明七子之经验教训，学古而不摹古呆仿，吸收营养而求出新。王闳运的《圆明园词》《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邓辅纶的《述哀诗》《鸿雁篇》，都是因现实生活激发深情而刻绘现实的名作。诗界革命派题材新鲜，面目较新，却不废学古。黄遵宪曾任多国外交官，后回国，1897年任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办新政，为变法维新的重量级人物。变法被镇压后，放归乡里。他主张“诗界革命”，倡导只要有真情实感，“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宣扬“我手写我口”，要表达“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要写出自己的特征，要有自己独有的风格。其诗内容广泛，多数表现那时重大历史事件，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以至将海外见闻及现代科学的新事物（电灯、电报、火车、轮船、机器等）写入诗中；改革语言，不少诗作趋向通俗化，然而也有一些作品因强调注重典雅而导致晦涩，露出新旧过渡转化之难以抹去之痕迹。其歌行体开阖纵横，气势流畅，言语较通俗朴厚。他对变革当时诗风，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代表作有《今别离》《哀旅顺》《度辽

将军歌》等。

总之，上述各位名诗人，凡属于“同光体”的，学古倾向重一些。然而却非只钻故纸堆，不关心现实政治。陈三立年轻时就辅佐巡抚父亲创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变法。其诗清奇拗涩，宗崇黄庭坚，早年多忧伤国事之作，为同光体诗人之首。其他各派，亦为这般。故而应说晚清诗之精华杰出作品，皆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反映那时期之社会现实，体现了那个时期文学的重大主题。其中最突出的当推“诗界革命派”，而此派艺术风格应当说承继了龚自珍之特色。之后突出宣扬民主革命的“南社”诗家，究其诗风仍未脱去龚自珍之影响，仍为对其创新之继承，和改良派之作除了政治上的改良修补和坚持革命之区分外，并无二致。“南社”诸位论诗，除推崇龚自珍外，也盛赞黄遵宪、丘逢甲。丘逢甲，其诗多发爱国激情，凌厉雄健，苍凉悲壮，气足势刚。“南社”诗人柳亚子云：“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沧海君”。柳亚子，1909年和陈去病、高旭等共同创办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辛亥革命后，从事反袁活动，思想随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断进步，1949年以后，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为近代著名爱国诗人，作诗“意气风发，声调激扬”，尤擅七言，喜欢用典，受龚自珍等人影响，风格雄健深沉，语言流畅清新。其时还有诗人苏曼殊，时人评价甚高。

从诗的体式规模和构成特色来看，清诗有发展创新。先从清诗所具风格讲，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谈到的无不具有，清诗作家各人有各人之面目，从而形成了诗界中很多的流派，异彩纷呈，与前朝七子千人一面之模仿复制品绝不相同。从七绝组诗规模上谈，龚自珍《己亥杂诗》共写三百多首，黄遵宪《己亥杂诗》八十多首，贝青乔《咄咄吟》120首，都超越前人数量，为规模庞大的组诗。姚燮的《南辕杂诗一百八章》参用《古诗十九首》、王粲《七哀诗》与杜甫单篇五言之形式，共写出108首大型组诗。从记游诗规模上说，姚燮的游览四明、普陀诗，刘光第的峨眉山记游诗，钱谦益的游黄山诗，皆为数十首描摹壮丽山川的组诗名篇。钱谦益之《投笔集》次杜甫《秋兴》韵达十三叠之多，史诗巨构，为七律步韵诗所未见。从一首诗的字数上讲，黄遵宪之《锡兰岛卧佛》竟达两千余言，字数之多，可谓有诗以来所未有。体式上亦有创新，黄遵宪之乐府诗，和汉乐府与元白新乐府，面貌全然不同。吴伟业的“梅村体”纪事形式，和元白“长庆体”相较，同中有变化。

从清诗作者总数、诗作总量、集子数量等方面来看，也是空前的。如作

者人数仅收入《晚清簪诗汇》中的就有六千余家（诗二万七千多首），比《全唐诗》的二千三百余家多出近四千人。那么清诗有多少？国家图书馆藏清诗总集就有二百余种，总集专类一百多种，清人别集多得难以统计，再加上分阶段的大型选本《清诗别裁集》《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湖海诗传》《国朝正雅集》《近代诗钞》所收，至少可说作者和诗作总量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清代诗论诗话之多，亦为以往朝代所不如。是什么原因造成清诗如此之多？不全因诗之发达，还因为：时代近，散佚少；清幅员广大，所谓蛮夷之地也发展成了发达地区；人口增加许多，最多时达四亿多人；“康乾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文人增多，弄墨吟诗者自会大增。当然光多不等于质量好。诗的水平如何主要看其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什么水平。清诗和以往朝代诗歌相较有很大发展，很多诗人把现实主义深化了，写出许多不朽史诗，它不只为时代之照相机，亦为时代之风雨表。前面谈到的顾炎武、王夫之，“岭南三大家”中屈大均、陈恭尹等，他们富于爱国主义民族思想的反清复明诗作，其尖锐深刻之程度超过历朝历代之诗作。清朝中后期，反映民族矛盾的诗作，渐趋隐晦曲折，这主要因“文字狱”打压所致，然仍顽强生长。清廷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吞瓜分，无能抵御，只知妥协投降，割地赔款。晚清许多诗人高举反帝反侵略的鲜明大旗，唱出时代之强音。如顾翰的《俞家庄歌》、张维屏的《三元里》为写渔民与农夫自发抗英的英雄史诗。赵涵《十哀诗》记录虎门到南京 10 座城市接连沦陷的过程，对抗英将领有褒有贬，对畏敌逃跑者口诛笔伐，对殉节死难者且歌且泣，为规模巨大的鸦片战争之组诗。揭露鸦片之祸害的有林寿春《罌粟花》、魏源《江南吟》、周乐《鸦片烟歌》等。贝青乔《哀甬东》、朱琦《老兵叹》、孙鼎臣《官兵行》、徐时栋《乞儿曲》等皆为表现鸦片战争的优秀诗篇。关于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等内容，关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侵华的内容在清诗中同样有深刻反映。

反映国内阶级矛盾，即反映农民暴动的诗作，从清初到晚清，从未中断。主要有：赵执信的《甯入城行》描绘了农夫暴动的全过程，具体形象；万斯同的《纳闯王》直接歌颂农民起义的好处；沙张白的《洛城谣》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如此正面直接写农民运动之诗，在清朝以前应说未曾出现。不只诗家写了，而且起义的斗士领袖们（如太平天国）还拿笔作刀枪，宣传歌颂太平天国的理想主张与业绩。这更是清诗的一大特色。清诗不仅写农民暴动，还有工矿题材和工人斗争之诗作。

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之诗，应为改良维新之先驱。变法维新的领

袖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纾、严复、黄遵宪等人之诗作，都起到唤醒民众推动社会进步之作用。谭嗣同，甲午中日战后，注重新学，协助陈宝箴创办新政，积极参加康梁领导的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后，拒绝出走，慷慨就义。其诗以反映时事和抒发理想怀抱为主，情辞激越，神完意足。

辛亥革命前，秋瑾、苏曼殊等的诗作表达了立志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要科学要民主的迫切愿望。这些都为以往无有之新观念、新思想。秋瑾，冲破种种阻力赴日留学，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回国后积极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后被捕就义。其诗多具时代内容，表达爱国精神与革命情怀理想，语言朴素自然，风格奔放豪迈。

清诗特征还表现在题材的扩大与广泛性上。如王鸣盛的《采煤叹》、钮琇的《采煤曲》寄寓了对采煤工人悲惨遭遇的无尽同情。陆元铉的《铜山行》记录了开采铜矿的砂丁们之非人生活。章永祚的《石油湾》描写陕西延长县发现石油，并赞其作用甚大。

明末清初，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被遗弃，乐府诗重新走向正道。钱澄之、申涵光、吴伟业率先写出较紧密表现现实政治与当时社会之乐府诗，拉开有清新乐府之幕布。接着吴嘉纪、邢昉二人满怀强烈的民族思想，爱明反清，激情赞扬爱明斗士，揭示批判清兵之凶暴残酷，同情民众之灾难与疾苦，打牢了清乐府运动之地基和台面。而沙张白则强调诗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意义，对白居易诗论加以发展，倡导“诗乃有韵之春秋”，为“匹夫匹妇之心声”，应该“奖正、刺邪、讽谏、箴规”。强调诗需创造，要写生活感受。他高举新乐府运动鲜明旗帜，活跃在乐府舞台上，掀起了一个高潮。和沙同时的名诗人还有汪琬、邵长蘅、陈恭尹、梁佩兰、朱彝尊等人，皆创作出不少现实意义强的新乐府。之后查慎行、顾嗣立、郑燮、蒋士铨、郑世元等亦以善乐府诗著称。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黄燮清、朱琦、赵涵、贝青乔、汤国泰、孙鼎臣等写过很多反帝反侵略、同情民众疾苦灾难之乐府诗（因篇幅所限，以上诗家作品可见丁力选注《清诗选》）。黄遵宪宣扬时代精神的大量的爱国新乐府，林纾的表达改良维新要求《闽中新乐府》，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某些新变化，可说是清乐府诗的又一高潮和胜利谢幕。

清诗不仅新乐府有新变化，各体杰作总趋势多用白描，用语明白如话。他们认识到只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才能更好表达思想，拉近和民众距离，使之喜闻乐见，更好起到教化作用。

清诗形式上有所突破，尤其五言七言限制的乐府诗，清人已打破之。王